

辽丰州白塔所见金元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简析

吴承峰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5日

摘要

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 俗称“白塔”, 蒙古语称为“查干索布尔嘎”, 是辽金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白塔不仅是丰州故城的标志性宗教建筑, 更是研究辽金元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多元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立体档案库。本文以建筑本体、碑刻铭文、墨书题记及出土文物为核心证据, 结合历史文献与区域考古成果, 系统考察了辽金元时期丰州地区在人口构成、经济形态、语言文字、建筑艺术等方面所呈现的多元文化共生交融图景。白塔及其所依托的丰州城, 生动体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农牧交错带”的深度互动, 以及草原丝绸之路作为文化通道在促进欧亚大陆东部文明交流中的关键作用, 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时期于边疆地域形成的动态过程与内在机理, 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提供了具象化的实证。

关键词

辽丰州白塔, 呼和浩特, 多元文化交融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n Hohhot Area during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Liao Fengzhou White Pagoda

Chengfeng W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February 25, 2026; accepted: March 4, 2026; published: April 15, 2026

Abstract

The Wanbu Huayanjing Pagoda, commonly known as the White Pagoda and called Qagan Suburga in Mongolian,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suburbs of Hohho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t is an important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long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Steppe Silk Road during the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s the landmark religious building of the ancient city of Fengzhou, the White Pagoda serves as a three-dimensional archive for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diverse culture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Liao, Jin and Yuan periods. Based on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stone inscriptions, ink-written notes and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ulti-cultural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in Fengzhou in terms of population composition, economic pattern, languages and scripts, and architectural art. The White Pagoda and the city of Fengzhou vividly demonstrate the in-depth interac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in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and highlight the key role of the Steppe Silk Road as a cultural corridor in promoting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continent. It profoundly reveals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luralistic-unifi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border areas in history, providing concrete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Liao Fengzhou White Pagoda, Hohhot,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平川之上，万部华严经塔(以下简称“白塔”)巍然矗立，其洁白的塔身在历史的风烟中已历经近千载春秋。这座典型的辽代楼阁式砖塔，属辽丰州城内一座佛教寺院的藏经建筑，其创建可追溯至辽兴宗(1131~1055年在位)至道宗时期(1055~1101年在位)。白塔所依托的丰州城，是辽金元时期丰州的治所，自辽神册五年(920年)建置，历金、元两代而持续繁荣，直至元末明初方渐废弃，其存续时间跨越四个半世纪，恰好涵盖了中国由辽、宋、西夏、金等政权并立走向元朝大一统的关键历史阶段。由于其地处连接中原腹地与蒙古高原、沟通东北亚与内陆亚洲的交通要冲，丰州城的历史命运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衰紧密相连，使其成为研究 10~14 世纪地处欧亚大陆东部的中国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理想样本。

白塔之所以能够超越单纯的宗教建筑范畴，成为历史学、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珍贵对象，在于其本体及内部保存了丰富且连续的历史信息层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其一，塔身结构与雕塑体现了辽代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高度融合的建筑艺术风格。白塔的八角砖木结构、闭合回廊、斗拱承檐、须弥莲座与砖雕造像、蟠龙柱饰，集中体现了辽代建筑“唐风骨架、宋式细节、契丹雄浑、多元融合”的核心风格，形成独特的辽式体系，其在源流上直接承袭唐代艺术，同时又吸收兼容了北宋以及北方游牧文化与佛教艺术[1]。其二，塔内一层回廊所嵌六通金代重修碑刻，详尽记载了金大定二年(1162年)重修事宜，并意外留存了当时丰州城的坊巷布局与周边村落名录；其三，遍布塔内各层壁面的数百条金、元、明时

期游人墨书题记，其文字种类囊括汉文、契丹文、女真文、回鹘体蒙古文、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古波斯文等[2]，构成了一部罕见的多语种文字“留言簿”；其四，塔内及遗址区出土的各类文物，如元代“中统元宝交钞”、陶瓷器等。这些材料共同构建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历史现场，为复原金元时期丰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态提供了直接证据。

本文旨在整合建筑考古、文献考据与文物分析的方法，以白塔为聚焦点，系统阐释金元时期丰州地区所发生的多元文化交融现象。我们认为，白塔并非一个静止的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持续进行文化吸纳、转化与再生产的动态场域。通过对这一微观案例的深入剖析，可以窥见宏观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体系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带通过日常交往、经济共生、信仰对话与艺术互鉴，最终促成一种新型地域文化的生成，并为中华文明的不断丰富与拓展注入活力。

2. 丰州城的历史地理定位与白塔的建筑学价值

欲理解白塔的文化意义，须首先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地理坐标之中。丰州城地处土默川平原，北倚阴山山脉，南濒黄河，正处于中国北方著名的“农牧交错带”的北缘。这一地理位置赋予其双重属性：既是中原王朝经略北方或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沿，亦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物资交换、技术传播与人口流动的自然界面。记述辽金元三代历史的官修史书皆不乏关于丰州的记载。据《辽史·地理志》：“丰州，天德军，节度使……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冻、九十九泉、没越冻、古磧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3]。”可见，辽代丰州西京道的军事重镇，西南面招讨司亦设置于此。金代则沿用了辽代的丰州建制，并根据需要一度将其地位进行了提升。《金史·地理志》载：“丰州，下，天德军节度使。辽尝更军名应天，寻复，金因之。皇统九年升为天德总管府，置西南路招讨司，以天德尹兼领之。大定元年降为天德军节度使，兼丰州管内观察使，以元管部族直撒、军马公事并隶西南路招讨司[4]”。据此，则金代的丰州亦属西京路，其行政与商贸功能较之前代有所增强。到了元代，丰州主要隶属于中书省直接管辖的“腹里”地区。《元史·地理志》记载：“丰州，下。唐初为丰州，又改九原郡，又仍为丰州。金为天德军。元复为丰州。旧有录事司并富民县，元至元四年省入州[5]。”丰州因位于元大都(今北京市)通往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及漠北哈拉和林的交通干道之上，驿站体系完备，发展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东段的关键枢纽城市[6]。这条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东起辽海，西逾阿尔泰，南接中原，北抵贝加尔，丰州恰处于其网络节点之一。

白塔作为丰州故城留存至今最醒目的地标，其建筑本身即文化交融的初步结晶。这座八角七层楼阁式砖塔，通高 55.6 米，塔体收分和缓，轮廓雄健稳重，体现了辽塔的典型气象。其基座为雕饰繁复的束腰须弥座，上承仰莲瓣，此种将印度佛教宇宙观象征元素与中国传统台基造型相结合的做法，其源流可追溯至唐代[7]。塔身第一、二层外壁以砖雕形式满饰佛像、菩萨、天王、力士及供养人像，转角处更饰以生动的蟠龙柱。这些雕像虽服务于佛教主题，但其造型手法融合了唐代艺术的雍容气度与北方游牧社会的刚健之风，面相丰腴而神情肃穆，衣纹流畅而富有体积感，代表了辽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塔身各层仿木构的斗拱、檐椽、门窗，则以砖材精准地模仿了中原本构建筑的细节，显示了工匠对中原建筑技术的熟练掌握。白塔最初的功能是储藏佛教华严宗经典《华严经》，其洁白外观通体涂刷白垩土，在广袤的绿色草原上形成强烈的视觉中心，使其从单纯的宗教建筑，逐渐升华为中国北方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的标志。金代的重修活动，不仅延续了其物质存在，更意味着该建筑的文化象征意义得到了不同政权下各族民众的持续认同。

3. 碑刻所见金代丰州的社会结构：多文化群体共居的社会形态

白塔内现存的金大定二年(1162 年)《丰州塔重修记》等碑刻，如同一幅精细的社会地图，勾勒出当

时丰州城内外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生动格局，其价值远超一般的功德记。

碑文明确记载了金代丰州城内实行“坊巷制”管理。城内划分为“东南坊、东北坊、西南坊、西北坊”四坊，这种规整的里坊布局承袭自隋唐以来的中原都城制度，是中央王朝行政权力与城市管理理念在此地实施的明证。更具社会学意义的是坊内街巷的命名：“牛市巷”“酪巷”显然指向牲畜贸易与乳制品加工，是游牧经济生活方式在城市空间中的烙印；“麻市巷”“染巷”则与纺织、印染手工业相关，反映了定居农耕社会的生产活动[8]。这种以行业命名的专业街巷，揭示了丰州城经济功能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其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堡垒，而是一座具有复杂内部经济分工的繁荣市镇。

尤为珍贵的是，碑阴镌刻了大量参与捐资修塔的社邑、村落名称，这些地名成为识别当时人口成分的切入点。其中，“李家户”“刘家庄”“薛家村”等以汉姓命名的村落，无疑是自汉唐以来持续屯垦，以及辽金时期招募中原农户实边政策所形成的汉族移民聚落[9]。而诸如“长寿谋尅庄”“捆刺乙里堇村”等，其名称明显源于女真语官职称谓[10]，“谋克”为百夫长而“里堇”为村寨首领，当为金朝建立后，随军事驻防或行政派驻而来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及其家属所形成的聚居点。

此外，碑文中还出现“西通使族”“移室族”等名目，可能指代当时活跃于该地区、尚未完全纳入州县体制的其他游牧或半游牧部族[11]。这些村落环绕丰州城四周，呈交错分布态势，直观地展示了金代生活在丰州故城的基层居民已经呈现出了多文化群体交错杂居的“互嵌式”结构。

4. 经济生活的复合性：农牧交错与丝路贸易的共生

丰州地区金元时期的经济基础，完美契合其地理区位，呈现出鲜明的农牧复合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活跃的跨区域贸易。

辽金元时期，诸政权统治者普遍推行的劝农政策，使丰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具备一定的基础。辽代“丁丑，(圣宗)诏减前岁括田租赋。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为丰州”[12]，金代“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劝举军民耕种”[13]。官方组织移民、兴修水利，使河谷平原地带得以垦殖，为城市人口和驻军提供部分粮秣。与此同时，丰州地区广袤的草原继续支撑着发达的畜牧业。出土碑刻中“牛市巷”“酪巷”的记载，证实了牲畜买卖与乳品加工已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耕牧兼营”的模式，使得社会资源得到多元化利用，既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也满足了不同族群的生产习惯与生活需求，构成了区域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石。

更为显著的是，金元时期，尤其是元代实现大一统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空前畅通，丰州作为交通节点的商业枢纽地位凸显。元人刘秉忠《过丰州》诗中“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半明城上楼。车马骈阗尘不断，吟鞭斜袅过丰州”[14]的描绘，正是其商贸繁盛的文学写照。丰州城内屡有整批完整器物出土，品类涵盖巨型莲瓣纹石柱础等建筑构件、石臼等生产工具、白瓷大瓮与碗碟等日用瓷具，亦有唐、宋、金、元各代铜钱等货币遗存。尤为重要的是，1972年于城内正中大土垆东部发现两处瓷器窖藏，窖中以大瓮盛物，内置钧窑香炉、龙泉窑花瓶各三件，此类精致的室内陈设器，均为两大名窑的罕见珍品[10]。上述遗迹与遗物的出土，充分佐证丰州在当时为一座兼具高度发达封建文明、与同期国内其他城市发展水平相当的中等城市。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与来自蒙古高原及西域的牲畜、皮货、毛织品、药材、玉石等，在此交汇互市。1983年，呼和浩特市文物工作者在维修辽代丰州白塔时，在塔壁缝隙中发现了一张“壹拾文元代中统元宝交钞”纸币，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纸币实物。该纸币长16.3厘米、宽9.5厘米，采用桑麻纸制作，票面朱印似为“河南诸路行中书省印”，推测发行于1260年至1276年，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15]。该纸币被上下四层折叠，外层折缝处的磨损痕迹较为明显。由此可见该中原地区印制的纸币至丰州时曾被多次流通使用，这为丰州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实证[16]，表明丰州商业交易量较大，需要轻便的信用货币，更意味着其已深度融入元朝中央政权所建立的全国性乃至跨区域

的金融体系之中。此外，丰州城遗址及周边墓葬中出土的诸多文物，具有草原风格的辽代仿皮囊容器绿釉鸡冠壶，与来自中原名窑的元代钧窑香炉、定窑白瓷共出，物质文化面貌上的混杂性，正是当时商品流通与消费品位交融的直接反映。塔内出现的古波斯文等题记，也为西亚商旅的可能存在提供了间接线索。

5. 白塔题记：多语言文字交融的微观现场

白塔内壁留存的金元明时期墨书题记，计有数百条之多，其价值在于它们并非官方刻意营造的纪念碑文，而是过往行旅自发留下的“即时记录”，因而更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交际状态与文化多样性。这些题记首先构成了一座罕见的“古代多语种文字陈列馆”。其使用的文字包括：通行于辽金元各个时代的汉文，主要通行于辽代的契丹小字，主要通行于金代的女真小字，蒙古汗国时期创制的回鹘体蒙古文及后来被元代官方推行的八思巴蒙古文；除了上述在中国境内使用文字外，白塔所见墨书题记中甚至还有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相关的古叙利亚文，以及可能来自中亚或波斯地区的古波斯文。多种文字并存于一室之内，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的直观诠释。其次，题记内容揭示了书写者的多元身份与社会活动。留名者中，有来自“大昊天寺”“西夏国仁王院”等各地寺院的僧侣，有管理“水鸦”的达鲁花赤、提控等各级军政官吏，有往来贩运的商贾，亦有普通的巡礼百姓。他们或记行程，或抒怀古之情，或祈愿平安，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人生片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体现的语言接触现象。部分题记以汉字音译书写非汉语人名；在八思巴文推行后，也出现了用这种拼音文字拼写汉语词汇的实例[17]。这些“互嵌式”的文本遗存，正是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在交往中尝试沟通、相互适应与学习的痕迹，是文化交融在语言学层面的生动体现。古叙利亚文题记的反复出现，这与元代丰州地区多信景教的主要居民之一汪古部的活动相联系，表明这座佛教塔寺的空间，也曾被其他宗教的信徒所共享和尊重，存在着一种超越具体信仰差异的、基于共同地域社会生活的宽容氛围。

6. 结论

丰州地区多文化背景的居民在长期相处中形成了其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的社会风貌，是历史上该地区聚落存立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内仿中原的坊市布局与周边具有游牧标识的聚落形态共同构成共居地理格局，为日常交往提供空间前提。

农牧交错的经济形态与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跨区域商贸活力，为文化互动提供持续物质动力[18]。各类融合性器物与跨地域商品的流通，进一步推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审美取向的互渗与趋同。语言文字的接触、转译与混用，则成为文化交融最直接的鲜活记录。白塔题记等底层史料，直观呈现多元文化在同一空间内的符号交流与意义协商，是文化融合的实证。白塔的千年存续，象征这一交融进程具有持久生命力。丰州地区在社会层面形成了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共居格局。

丰州的文化交融既是草原丝绸之路繁荣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典型例证。对其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历史认知，对于当代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基金项目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4 年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白塔耸光’——丰州故城万部华严经塔保护与发展调查”，项目编号：S202410135036。

参考文献

- [1] 刘利平. 万部华严经塔砖雕盘龙柱[J]. 大众考古, 2024(11): 84-86.
- [2] 王巍.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619.
- [3] (元)脱脱, 等. 辽史: 卷四十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08.
- [4] (元)脱脱, 等. 金史: 卷二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65.
- [5] (明)宋濂. 元史: 卷五十八[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376.
- [6] 曹永年. 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1992(3): 91-99.
- [7] 张汉君. 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規制初探[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4(2): 70-71.
- [8] 康建国. 历经千年的城市坐标: 丰州古城 白塔巍巍[EB/OL]. 中国日报网, 2020-12-15. https://ml.mbd.baidu.com/r/1O9jmx33ifu?f=cp&rs=1214156736&ruk=VFU0HgQQ7mhsQY30qAvoIw&u=1c8da6fda323a103&urlext=%7B%22cuid%22%3A%22liv68_iZ2age-iSii_aH2i08N2tgNOSfg08H2ili928YGiS80juSM8jf53O5gi1RGbl8mA%22%7D, 2025-12-13.
- [9] 李逸友. 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J]. 文物, 1977(5): 55-64.
- [10] 李逸友. 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J]. 考古, 1979(4): 365-374.
- [11] 万部华严经塔的唐宋金元各代题记[EB/OL]. 内蒙古历史文化遗迹多媒体资源库. http://www.nmgcnt.com/tszy/nmgslwh/lsyjgt/lgst/wbhyjt/wbhyjtzd/201208/t20120826_29520.html, 2025-12-13.
- [12] (元)脱脱, 等. 辽史: 卷十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46.
- [13] (元)脱脱, 等. 金史: 卷四十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051.
- [14] (元)刘秉中. 藏春集: 卷三[M]. 四库全书本, 1792: 16.
- [15] 卫月望. 白塔中统元宝交钞考说[J]. 北方金融, 2002(S1): 72-74+67.
- [16] 王大方. 世上现存最早纸币实物 印证元代民族大融合[N]. 内蒙古日报, 2023-12-04(5).
- [17] 布日古德, 青格力. 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八思巴文题记释读[J]. 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 2022(1): 57-61, 188.
- [18] 张景明, 李文静. 草原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以宋辽夏金元时期为中心[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4(5): 152-157.